

中等收入群体的代际流动： 户籍与教育的视角

吕 鹏 范晓光

摘 要：在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征途中，如何打造一个更加公平的户籍和教育制度尤为关键。代际流动研究长期以收入和职业作为最核心的理论关怀，而以户籍和教育本身作为考察对象的相关研究在国内并不多见。基于对 CSS 2015 资料的充分挖掘，本文对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户籍和教育流动率、教育和户籍流动的部门分割、教育与户籍的关联性展开了一项探索性研究。最后，探讨了公平的流动制度在缓解阶级固化方面的意义和可能的政策选择。

关键词：中等收入群体 代际流动 户籍 教育再生产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2338(2017)04-0133-08

作者简介：吕鹏，男，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情调研与大数据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学。

范晓光，男，浙江大学社会学系、浙江大学地方政府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社会学。

一、代际流动中的城乡分割与教育再生产

中等收入群体的“焦虑”从没像今天这样成为舆论界关注的一个热点。这不仅由新的网络生态环境引起，更与人们切身体会到的阶层地位的“代际固化”息息相关。对于许多人来说，迈入“中等收入”可能仅仅是自身这一代才发生的事情。为了保住脆弱的安全感，中产在房子和子女教育上透支了他们的“中产生活”——前者在很多大城市意味着户籍准入，后者则意味着让子女保住他们获得今天中产地位的入场券。简言之，“代际流动”是理解中产焦虑的一把钥匙。

社会科学界研究代际流动存在两个最主要的角度或测量方式。一是经济角度的，主要是（家计）收入代际流动^[1-5]，偶尔包括一些财富代际流动的研究^[2]。二是社会角度的，主要是职业代际流动^{[6][7]}和教育代际流动^[8-13]。

不管是认定当代中国代际流动的流动性是高还是低，大多数研究都或多或少地提到了户籍制度在代际流动上的关键角色。对于认为代际流动率低的学者来说，户籍是城乡二元结构得以再生产的基础制度，是阻碍流动人口实现社会融合的主要制度性障碍^{[11][14]}。户籍形成了城乡两个封闭的循环圈，使原本就存在的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15]。

相反，对于那些认为代际流动趋于上升的学者来说，户籍本身可以通过“获致性”努力改变这一

事实,正是中国社会保持“开放性”的一个重要设计^[16]。必须承认的是,改变户籍,是许多人——尤其是“第一代城市中产”——实现代际流动的关键一步。有研究者就认为,当代中国农民的代际流动率相当高,城市中的社会流动也具有相当的“开放性”,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一些人可以获得城市户口。^[17]还有研究者则更进一步地指出,子代实现代际向上流动的主要路径,按重要性依次为教育、入党、进入体制内单位就业^[18]。

在大多数情况下,教育流动是实现户籍流动的第一道关卡。许多研究都发现教育是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变量,但教育获得本身受家庭背景的影响^[19]。尽管有学者认为公共教育支出的扩大有利于促进代际收入流动^{[20][21]},但教育扩招本身并不能自动提高代际流动^[22];更关键的是教育制度各个环节的改革是否公平公正,这就反过来又要求教育流动首先要打破户籍流动的障碍。麻烦的是,许多研究都认为教育的代际流动性在下降^[11-12,23-26],农村学生希望通过获得高等教育来实现自身的向上流动越来越困难^[13]。这些情况的出现,都要求我们将教育与户籍在代际流动上的交互效果纳入分析的视野。

除此子代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之外,户籍流动和教育流动是否在不同的部门(体制内和体制外)存在差异,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议题。比如,农村户籍的孩子通过教育也许可以提高自身的阶层地位(获得一份中产阶层的职业或提高收入),但是否可以获得城市户口,可能依然取决于是否能够在体制内就业。

本文将对户籍和教育流动率、教育和户籍流动的部门分割、教育与户籍的关联展开分析。与许多研究将户籍和教育视为代际流动的阻碍或刺激因素不同,本文将户籍和教育状况本身作为代际流动的结果进行单独的分析。在接下来的第二到第三部分里,我们将首先分析中等收入群体的户籍流动,然后是教育流动。每一部分,我们将首先进行流动表的展示,然后就教育、户籍和体制进行列联分析,最后对户籍与教育进行对数线性模型拟合优度比较。本文的第四部分是总结与讨论。

本文使用2015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CSS 2015),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组织实施,使用多阶段随机抽样的方法,范围基本涉及中国大陆地区30个省级行政区的城乡区域,调查对象为18岁以上的中国公民,样本量共计10243。

我们以个人收入中位值为参照标准,将收入等于中位值的0.75倍及以下的人群定义为低收入群体,将收入高于中位值的0.75倍但是低于中位值的1.25倍(包括1.25倍)的人群定义为中低收入群体,将收入高于中位值的1.25倍但是低于中位值2倍(包括2倍)的人群定义为中高收入群体,将收入高于中位值2倍的人群定义为高收入群体。

二、中等收入群体的户籍流动

户籍流动指的是户籍的代际差异。数据显示,在父代为农业户籍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中,有84.52%仍然为农业人口,仅有15.48%获得了非农业户籍;而在父代为非农业户籍人口的中等收入群体中,有89.05%保持了非农业户籍身份,其余近10个百分点为农业户籍。表明不论是农业还是非农业户籍,流出率都偏低,呈现明显的代际继承(inter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或“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的特性。

表1报告了不同教育程度中等收入群体的户籍状况。在小学及以下学历的中等收入居民中,父代为农业户籍的占了90.58%,比非农户籍高了近八成;子代的农业户籍占比超过八成(82.82%),与非农户籍相差超过六成。在初中学历居民中,其父代为农业户籍的占比为78.17%,非农户籍为21.83%;子代的相关占比分别为67.25%和32.75%。在高中学历者中,父代农业人口为55.74%,仅仅比非农人口多近10个百分点;然而,在子代中,农业户籍占比低于非农户籍,这与初中及以下呈现明显反差。在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中等收入群体中,父代是农业人口的比重略高于非农业人口,但是子代的非农业户籍占比是农业户籍的2倍多。

此外,从相异指数(index of dissimilarity)看,20%以上的不同学历中等收入群体的父代改变其户

	小学及以下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农业	非农	农业	非农	农业	非农	农业	非农	Δ
父代	90.58	9.42	78.17	21.83	55.74	44.26	52.67	47.33	20.56
子代	82.82	17.18	67.25	32.75	41.77	58.23	30.91	69.09	18.72

注:Δ 为户籍在教育程度上的相异指数。

为了更近一步地分析户籍流动的差异,我们做出如下的界定:如果父代与子代的户籍类型相同,我们就可以视为一种稳定或水平流动的状态;如果不同,则是一种向上或向下流动状态。鉴于长期以来中国的各种资源分配主要是向城市倾斜,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视非农户口为一种比农业户口更加“珍贵”的身份。因此,我们把从农业户口转变成为非农户口视为向上流动,反之则为向下流动。

表 2 是对户籍流动教育分割的考察。在稳定的农业户籍型中等收入群体中(子代与父代都是农业户籍),子代的学历是大专及以上的占了 9.24%,初中及以下合计超过 75%,高中学历为 15.2%;在稳定的非农户籍性中等收入群体中,大专及以上的占比三成略多(31.82%),而初中及以下仅有 32.15%。

表 2 中等收入群体户籍流动的教育分割(单位:%)

父代		子代(农业)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农业	31.01	44.56	15.20	9.24
	非农	17.33	56.00	16.00	10.67
		子代(非农业)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及以上
	农业	9.70	28.36	27.61	34.33
	非农	6.01	26.14	36.04	31.82

在向下流动者中(子代是农业户口而父代是非农),初中的占比最高,超过一半,加上小学文化程度,略高于七成,而大专及以上仅占一成有余。在向上流动者中(子代是非农户口而父代是农业户口),大专及以上占比最高,超过 1/3。从因果链条来看,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子代通过高等教育改变了户籍,由农业户口变成了非农户口。

表 3 考察了户籍流动的部门分割。在经历“农业-农业”水平流动的中等收入群体中,有超过九成(94.19%)在非国有部门就业,仅有 5.81%在国有部门就业;在经历“非农-非农”水平流动的中等收入群体中,有七成(71.84%)在非国有部门就业,国有部门就业者超过 1/4(28.16%)。在经历“农业-非农”向上流动的中等收入群体中,有 30.22%在国有部门就业;而在经历“非农-农业”向下流动者在国有部门的就业比例仅为 11.84%。总体而言,在户籍上拥有向上流动的中等收入群体在国有部门就业的比例更高,向下流动者的国有部门就业率仅高于来自农业户籍家庭的农业户籍者。

表 3 中等收入群体户籍流动的部门分割(单位:%)

		子代			
		农业		非农	
		国有	非国有	国有	非国有
父代	农业	5.81	94.19	30.22	69.78
	非农	11.84	88.16	28.16	71.84

下面我们考察中等收入群体的户籍流动分割。如表 4 所示,我们从独立模型(模型 1)为起点,依次调整模型设定。模型 2 增加了父代户籍与教育程度的关联项,模型 3 增加了教育程度与子代户籍的关联项,模型 4 增加了父子户籍关联项,模型 5 同时纳入父代户籍与教育、子代户籍与教育的关联项,模型 6 在模型 5 基础上还增加了父子户籍关联项。模型 1 的 G^2 为 1686.16,有 34.06% 的样本被错误识别,BIC 为 1608.25。在模型 2 - 模型 4 中,模型 4 未被解释的变异最低,并且 BIC 也相对较小。模型 1 - 模型 5 都与原始列联表分布存在显著差异($p < .000$),仅有模型 6 没有显著差异。经过拟合度比较,模型 4 比模型 5 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前者更为简约,同时模型 6 又与模型 4 之间有显著差异,再结合 BIC 值,故模型 6 为最佳模型。因此,在控制父代户籍后,子代教育程度和户籍关联(association),但不随着父代户籍的变化而变化;控制子代教育后,父代和子代户籍关联,但不随着子代教育的变化而变化;控制子代户籍后,父代户籍和子代教育关联,不随着子代户籍的变化而变化。

表 4 户籍流动与教育程度的对数线性模型拟合优度比较

模型	参数设定	G^2	df	p	Δ	BIC	模型比较	rG	rdf	p
1	F, E, S	1686.16	10	0.000	34.06	1608.25	1 vs 2	264.11	3	0.000
2	F, E, S, FE	1422.05	7	0.000	30.80	1367.51	1 vs 3	195.65	3	0.000
3	F, E, S, ES	1226.4	7	0.000	30.05	1171.86	1 vs 4	769.17	3	0.000
4	F, E, S, FS	457.23	9	0.000	19.39	405.10	5 vs 4	505.06	5	>.050
5	F, E, S, FE, ES	962.29	4	0.000	24.08	931.12	4 vs 6	454.89	6	0.000
6	F, E, S, FE, ES, FS	2.34	3	>.05	0.82	-21.04	-	-	-	-

注:F 为父代户籍,E 为子代教育程度,S 为子代户籍。

表 5 是户籍流动与工作部门的对数线性模型拟合度的分析。经过统计分析显示,模型 1 有 25.65% 的样本被错误识别,模型 2 和模型 3 的相异指数基本相似,而模型 4 仅为 4.68%,自由度为 2,比其它拟合模型都要小;BIC 的比较结果与变异系数并没有差异。跨模型比较表明,模型 4 和模型 5 没有显著差异,但是按照简约性原则,模型 4 为最优模型。因此,工作部门独立于父代户籍和子代户籍,但父子的户籍存在相互关联。

表 5 户籍流动与工作部门的对数线性模型拟合优度比较

模型	参数设定	G^2	df	p	Δ	BIC	模型比较	rG	rdf	p
1	F, R, S	1055.36	3	0.000	25.65	1031.98	1 vs 2	25.1	1	0.000
2	F, R, S, FR	1030.26	2	0.000	25.57	1014.67	1 vs 3	34.21	1	0.000
3	F, E, S, RS	1021.15	2	0.000	24.15	1005.56	1 vs 4	938.2	1	0.000
4	F, E, S, FS	117.16	2	0.000	4.68	101.57	1 vs 5	47.64	2	0.000
5	F, E, S, FR, RS	1007.72	1	0.000	23.81	999.92	4 vs 5	890.56	1	>.050

注:F 为父代户籍,R 为子代工作部门,S 为子代户籍。

三、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流动

与户籍流动类似,教育流动是指教育的代际变化。在父亲为小学以下学历的子代中,小学以下学历者占比为 30.59%,初中学历占了 42.23%,高中占 18.05%,大专以上的仅为 9.13%。在父代为初中文化的子代中,小学以下占比仅为 9.44%,而高中和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比之和超过总数的一半。相对于父代为初中或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子代而言,高中和大专以上父代的子女教育程度优势更为明显。譬如,高中学历者的后代获得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近 70%,大专以上者后代的相应比例高

达 79%。通过统计可得,总流动率为 67.59%,向上流动率为 60.40%,向下流动率为 7.19%。这表明,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流动以向上流动为主,与户籍流动的再生产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图 1 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流动(单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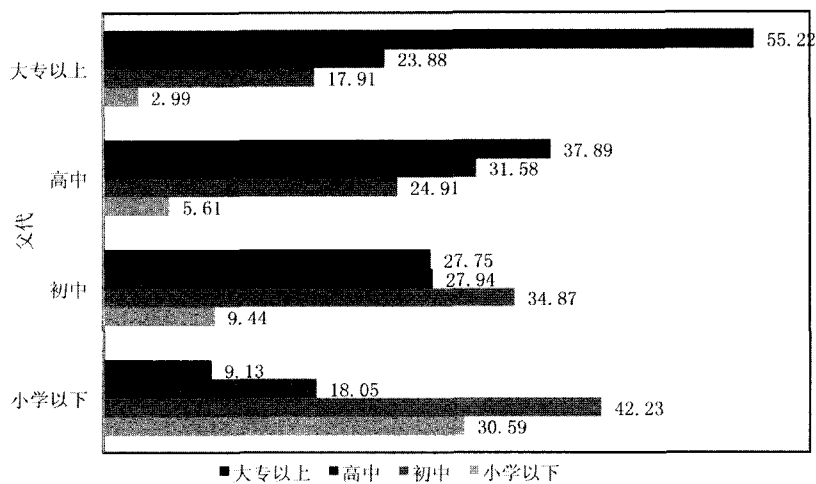


表 6 是对教育程度的部门差异的描述统计。在国有部门就业的子代中,其父代拥有小学学历的比重接近 50%,初中学历为 26.82%,高中和大专以上分别为 21.28%和 5.25%;而子代自己所拥有学历占比最高的是大专以上,高达 45.64%,其次是高中(28.64%)和初中(19.69%),最少的是小学学历,只有 6.04%。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子代中,有超过六成的父代为小学文化,初中文化占了 21.72%,高中占 10.78%,大专以上最低,低于 5%(2.54%);而子代的小学和初中学历比重合计超过七成,但是比重最大的为初中,而不是和父代那样为小学学历。

表 6 不同部门居民的教育状况边缘分布(单位:%)

	国有				非国有				Δ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以上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以上	
父代	46.65	26.82	21.28	5.25	64.95	21.72	10.78	2.54	21.27
子代	6.04	19.69	28.64	45.64	34.32	38.65	18.66	8.37	22.32

注:Δ 为教育在户籍上的相异指数。

表 7 考察了教育流动的部门分割。对目前就职于国有部门的子代而言,小学学历父代的子女拥有大专以上学历的占比为 41.51%,而低于其他学历父代的子女。在非国有部门的子代中,其父代学历为小学和初中者仍然以小学/初中学历为主(33.62%和 40.28%),而父代为高中和大专以上者的学历也呈现和他们父代类似的结构特征。比较表明,国有部门的教育流动以向上流动为主,而非国有部门则属于不流动的“继承”模式为主。

表 7 中等收入群体教育流动的部门分割(单位:%)

父代 \ 子代	国有				非国有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以上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以上
小学	6.29	24.53	27.67	41.51	33.62	44.44	16.85	5.09
初中	2.17	9.78	30.43	57.61	11.01	40.28	27.4	21.31
高中	-	9.59	30.14	60.27	7.55	30.19	32.08	30.19
大专以上	-	11.11	11.11	77.78	4.08	20.41	28.57	46.94

表 8 考察了教育流动的户籍分割。在农业户籍人口中,小学学历者后代有 29.10% 仍然为小学学历,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的相应比重分别为 45.03%、30.16% 和 33.33%;父代为小学和初中的子代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并不高。在非农业户籍人口中,小学、初中、高中和大专以上的教育程度被“传递”的比例分别为 10.85%、18.46%、32.70% 和 61.11%;与农业户籍人口相比,父代为小学和初中的子代拥有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比例明显偏高。由此可见,农业户籍人口的教育流动以向下流动为主,而非农户籍人口则以向上流动为主。

表 8 中等收入群体教育流动的户籍分割(单位:%)

子代 父代	农业				非农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专以上				
小学	39.10	44.90	11.30	4.70	10.85	36.03	33.72	19.40
初中	11.49	45.03	22.98	20.50	5.64	18.46	36.41	39.49
高中	10.32	39.68	30.16	19.84	1.89	13.21	32.70	52.20
大专以上	16.67	33.33	16.67	33.33	-	14.81	24.07	61.11

接下去,我们来分析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流动分割。如表 9 所示,我们仍然从独立模型(模型 1)为起点,依次调整模型设定。模型 2 增加了父代教育与户籍的关联项,模型 3 增加了户籍与子代教育的关联项,模型 4 增加了父子教育关联项,模型 5 同时纳入父代教育与户籍、子代教育与户籍的关联项,模型 6 在模型 5 基础上还增加了父子教育关联项,模型 7 是对数乘积模型(Xie, 1992)。模型 1 的 G^2 为 880.46,有 24.23% 的样本被错误识别,BIC 为 694.68。在模型 2 – 模型 4 中,模型 4 未被解释的变异最低,并且 BIC 也相对较小。模型 1 – 模型 5 都与原始列联表分布存在显著差异($p < .000$),仅有模型 6 和模型 7 没有显著差异。经过拟合度比较,模型 4 比模型 5 没有显著差异,但是前者更为简约,故模型 4 更佳;而模型比较还显示,模型 6 的 BIC 最小,拟合优度优于模型 4 和模型 7。因此,在控制父代教育后,子代教育程度和户籍关联(association),但不随着父代教育水平的变化而变化;控制子代户籍后,父代和子代教育关联,但不随着子代户籍的变化而变化;控制子代教育后,父代教育和子代户籍关联,但不随着子代教育的变化而变化。

表 9 教育流动与户籍的对数线性模型拟合优度比较

模型	参数设定	G^2	df	p	Δ	BIC	模型比较	rG	rdf	p
1	F, H, S	880.46	24	0.000	24.23	694.68	1 vs 2	126.27	3	0.000
2	F, H, S, FH	754.19	21	0.000	22.30	591.63	1 vs 3	301.34	3	0.000
3	F, H, S, HS	452.85	21	0.000	16.61	290.29	4 vs 3	29.20	6	0.000
4	F, H, S, FS	482.05	15	0.000	19.42	365.94	4 vs 5	155.47	3	>.050
5	F, H, S, FH, HS	326.58	18	0.000	13.49	187.24	4 vs 6	467.40	6	0.000
6	F, H, S, FH, HS, FS	14.65	9	0.101	1.79	-55.02	5 vs 6	311.93	9	0.000
7	unidiff	13.70	8	0.080	2.00	-48.3	5 vs 7	312.88	10	0.090

注:F 为父代教育,H 为子代户籍,S 为子代教育。

表 10 是教育流动与工作部门的对数线性模型拟合度的分析。经过统计分析显示,模型 1 有 21.27% 的样本被错误识别,模型 2 和模型 3 的相异指数差别不大,而模型 4 仅为 11.77%,自由度为 15,比其它拟合模型都要小。跨模型比较表明,模型 5 和模型 7 没有显著差异,模型 6 与原始列联表分布没有显著差异($p > .1$) 优于模型 5,故我们认为模型 6 为最优模型。因此,工作部门与父代教育和子代教育都存在关联,同时父子的教育也存在关联。

表 10 教育流动与工作部门的对数线性模型拟合优度比较

模型	参数设定	G ²	df	p	Δ	BIC	模型比较	rG	rdf	p
1	F, R, S	748.19	24	0.000	21.27	562.35	1 vs 2	49.39	3	0.000
2	F, R, S, FR	698.80	21	0.000	20.91	536.19	1 vs 3	287.02	3	0.000
3	F, R, S, RS	411.78	21	0.000	16.42	249.18	3 vs 4	62.13	6	0.000
4	F, R, S, FS	349.65	15	0.000	11.77	233.50	5 vs 4	12.75	3	0.005
5	F, E, S, FR, RS	362.40	18	0.000	14.32	223.02	5 vs 6	351.42	9	0.000
6	F, E, S, FR, RS, FS	10.98	9	0.277	1.76	-58.71	5 vs 7	4.28	10	0.570
7	unidiff	6.70	8	0.680	1.00	-55.30				

注:F 为父代教育,R 为子代工作部门,S 为子代教育。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2015 年的数据,就代际之间的户籍和教育流动展开了一项探索性的研究。就户籍来说,不论是农业还是非农业户籍,“社会再生产”都是主导性的特性;但有意思的是,中等收入群体的教育流动以向上流动为主,与户籍流动的再生产模式形成鲜明对比。

我们并不是在否认当前教育再生产的存在乃至强化,但至少对这一批成年的中等收入居民来说,户籍壁垒的岿然不动和教育流动的积极作用,是一个有趣的对比。显然,教育成为一代人改变自身阶层地位的重要机制。

吊诡的是,对下一代人来说,未来的图景可能要“倒转”过来:教育再生产的壁垒越来越强化,而户籍的藩篱却在悄然松动。这不仅仅表现在农村居民收入已经多年增长快于城镇居民收入增速^[27],更表现在多地已经开始打破甚至废除城乡户籍制度,通过种种方式吸引流动人口成为“新市民”。对未来的代际流动来说,就如教育扩招本身并不能促进代际流动一样,户籍松动之后,公共产品的供给是否也会朝着积极的方向改变,如何促进代际流动,才是问题的关键。

教育能够成为代际流动的促进剂,是因为在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的回馈效应。本文发现,父代的教育资本较弱的子女,实现教育向上流动之后,很多去的是国有部门;户籍上拥有向上流动的中等收入群体在国有部门就业的比例更高,向下流动者的国有部门就业率仅高于来自农业户籍家庭的农业户籍者。这可能说明了一个公平的人才制度、尤其是公务员制度的重要性。同样的,户籍松动之后,这种松动如何才能成为促进代际流动的利器,关键也是在劳动力市场。

目前我国人均 GDP 据估算已经超过 8500 美元,正在朝 10000 美元的大关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关于我国是否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讨论成为高层、学界和舆论关注的一个热点。各界的一个共识是,要想继续保持国民收入递增的势头,公平的制度保障下的开放社会是关键;在这样的社会里,先赋性的障碍(如户籍)要降低,后致性的成绩(如自己学习得到的受教育水平和技术技能等)要提高;更重要的是,降低这两个因素(比如户籍与教育)之间的关联,破除教育代际传递的城乡差异和户

参考文献:

- [1] 陈琳,袁志刚.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财富资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中国代际收入流动[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
- [2] 刘建和,胡跃峰. 基于家庭财富资本的居民收入代际传递研究[J]. 浙江金融,2014(9).
- [3] 汪燕敏,钱珍. 收入代际流动计量偏误的文献综述[J]. 生产力研究,2009(21).
- [4] 王美今,李仲达. 中国居民收入代际流动性测度——“二代”现象经济分析[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
- [5] 魏颖. 中国代际收入流动与收入不平等问题研究[M].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9.
- [6] 李路路,朱斌. 当代中国的代际流动模式及其变迁[J]. 中国社会科学,2015(5).
- [7] 秦广强. 代际流动与外群体歧视:基于2005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J]. 社会,2011(4).
- [8] 李春玲. 教育不平等的年代变化趋势(1940—2010)——对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再考察[J]. 社会学研究,2014(2).
- [9] 李路路. 制度转型与分层结构的变迁——阶层间相对关系模式的“双重再生产”[J]. 中国社会科学,2002(6).
- [10] 李忠路,邱泽奇. 家庭背景如何影响儿童学业成就?——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差异分析[J]. 社会学研究,2016(4).
- [11] 刘志国,范亚静. 教育的代际流动性影响因素分析[J]. 教育科学,2013(1).
- [12] 吴晓刚. 中国当代的高等教育、精英形成与社会分层——来自“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初步发现[J]. 社会,2016(3).
- [13] 辛凯璇. 我国教育代际流动的城乡差异[D]. 西南财经大学,2016.
- [14] 李涛,任远. 城市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J]. 南方人口,2011(3).
- [15] 余秀兰. 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对1978年至1990年代末教育政策的分析[J]. 教育发展研究,2005(4).
- [16] 张翼. 中国人社会地位的获得——阶级继承和代内流动[J]. 社会学研究,2004(4).
- [17] 吴晓刚. 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J]. 社会学研究,2007(6).
- [18] 阳义南,连玉君. 中国社会代际流动性的动态解析——CGSS与CLDS混合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15(4).
- [19] 张桂金,张东,周文. 多代流动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J]. 社会,2016(3).
- [20] 李力行,周广肃. 家庭借贷约束、公共教育支出与社会流动性[J]. 经济学(季刊),2015(1).
- [21] 徐俊武,易祥瑞. 增加公共教育支出能够缓解“二代”现象吗?——基于CHNS的代际收入流动性分析[J]. 财经研究,2014(11).
- [22] 杨中超. 教育扩招促进了代际流动? [J]. 社会,2016(6).
- [23] 李春玲. “80后”的教育经历与机会不平等——兼评《无声的革命》[J]. 中国社会科学,2014(4).
- [24] 刘精明. 国家、社会阶层与教育:教育获得的社会学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 [25] 唐俊超. 输在起跑线——再议中国社会的教育不平等(1978—2008)[J]. 社会学研究,2015(3).
- [26] 吴愈晓. 教育分流体制与中国的教育分层(1978—2008)[J]. 社会学研究,2013(4).
- [27] 李培林,朱迪. 努力形成橄榄型分配格局——基于2006—2013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的研究[J]. 中国社会科学,2015(1).